

回顾一次写作

——《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

谢 冕	孙绍振	刘登翰
孙玉石	殷晋培	洪子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顾一次写作 :《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谢冕等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301-13015-5

I. 回... II. 谢... III. 新诗—诗歌史—研究—中国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1447 号

书 名: 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

著作责任者: 谢 冕 孙绍振 刘登翰 孙玉石 殷晋培 洪子诚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015-5/I · 199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刷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 开本 19.75 印张 311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前 言	(1)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	
——“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	(4)
新诗发展概况	
女神再生的时代	
——《新诗发展概况》之一	(69)
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高潮	
——《新诗发展概况》之二	(84)
暴风雨的前奏	
——《新诗发展概况》之三	(100)
民族抗战的号角	
——《新诗发展概况》之四	(113)
唱向新中国	
——《新诗发展概况》之五	(127)
百花争艳的春晨	
——《新诗发展概况》之六	(144)
唱得长江水倒流	
——《新诗发展概况》之七	(168)
学术踪迹自述	
谢冕	
文学是一种信仰	(189)
流向远方的水	(203)

孙绍振

我的桥和我的墙

——从北大出发的学术道路..... (213)

满脸苍蝇

——1958 年北京纪念 (225)

刘登翰

迟到学术生命的晚来良缘..... (230)

心中的北大..... (239)

孙玉石

学术问路自述..... (245)

给我一枝花吧..... (271)

洪子诚

回答六个问题..... (278)

语文课外的书..... (293)

编著要目

谢冕简历及编著目录..... (300)

孙绍振简历及编著目录..... (303)

刘登翰简历及编著目录..... (304)

孙玉石简历及编著目录..... (305)

洪子诚简历及编著目录..... (307)

殷晋培简历及编著目录..... (309)

编后记..... (310)

前 言

1958 年底到 1959 年初,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在《诗刊》社和徐迟先生的建议、组织下,利用不到一个月的寒假时间,编写了《新诗发展概况》。“概况”是“当代”最初出现的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文稿之一。全文约十余万字,分为七章:一、女神再生的时代;二、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高潮;三、暴风雨的前奏;四、民族抗战的号角;五、唱向新中国;六、百花争艳的春晨;七、唱得长江水倒流。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各章依次由刘登翰、殷晋培、洪子诚、孙玉石、孙绍振、谢冕、殷晋培执笔。前四章分别刊登于《诗刊》(北京)1959 年 6、7、10、12 月号。由于不明究竟,但可以推测的原因,后三章没能在《诗刊》继续刊载,仅存当时的油印打字稿(第五章)和手稿(第六、七章)。随后,《诗刊》社向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推荐,拟出版单行本,没有被接受。“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曾经打算对“概况”进行修改扩充,成为一部完整的新诗史。当时虽然重写了一些章节^①,但由于时势更易,他们各自的兴趣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转移,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无疾而终了。

近来,一些年轻的从事新诗研究的朋友,建议将“概况”整理出版,作为了解 50 年代诗歌观念,诗歌史叙述方式,大学教育和学术体制的资料。这个提议重新引起他们对这件事的关注。当然,他们明白,这些特定时代催生的文字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事实上,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对新诗史的看法,

^① 1978—1979 年间,重写的章节有:《年青的觉醒者的歌唱——〈中国新诗发展史〉之一节》,孙玉石撰写,刊于《山西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颂歌的时代——时代的颂歌(1949—1957)——〈中国新诗发展史〉第六章第一节》,孙绍振、刘登翰撰写,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这两篇改写稿发表时仍署名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

80年代以来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此,在重新刊行“概况”的同时,他们觉得更需要对这一文本,连同这一文本产生的过程,进行清理和反思。“反思”主要不是做简单的自我指责,不是站在对立位置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在参照思考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呈现推动这一事情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这些条件如何塑造写作者自身。这既涉及整体性的政治、文化气候,也与个人的生活经验、思想情绪相关。因此,拟定了若干问题,由各人分别以书面方式独立作答。由于之前和之后他们对此并未有过沟通,回答时也没有看到其他人的文字,因此,记忆中的细节、对事情的描述和评价既有相近的部分,也不可避免会有差异,相对于众口一辞,这种差异其实倒是更值得重视。

出版这本书的理由,除了上面说到的以外,也还有他们“私心”的方面。1958年他们的合作,距今已将近50年。这六人中,年龄最大的是谢冕,出生于1932年,其他诸人,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殷晋培、洪子诚,分别出生于1935、36、37、38和39年。按照现在的说法,在50年代他们是属于“30后”。当初这些或风度翩翩,或其貌不扬,或才华横溢,或木讷迟钝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是头童齿豁,垂垂老矣(殷晋培1992年初因病辞世)。因此,他们想借这本书的出版,作为他们50年前开始的合作,和在合作中产生并延续的友谊的自我纪念。学生时代形成的友情,经年历岁,似乎没有受到时空分割、世事纷扰的严重磨损,想起来他们真的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虽然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摩擦、矛盾,最终却总能互相取自省、宽容、信任的态度,这种友情,确实是他们平凡生命中值得珍惜,令他们时时感到温暖的财富。

本书除“前言”外,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各人对50年代编写《概况》时情景的回忆。这些回忆文字汇总之后,由洪子诚加以编辑整理,并加上了注释。尊重各位作者的原意,整理仅限于某些文字方面,如笔误,对重复的事实、细节的压缩等。第二部分是《新诗发展概况》的全文。第一至第四章依据1959年《诗刊》发表稿编入,第五至第七章依据油印打字稿和手稿录入。除了个别错、漏字之外,一律不做任何改动,以保持其原来面貌。本来还打算将1978—1979年对“概况”所做的修改部分也作为一个部分编入,限于篇幅,只好放弃。第三、第四部分,是各人回顾自己学术道路的自述文章,以及他们的主要编著目录。这些文章选自他们已发表的论著,从中可以看

到他们上世纪 60 年代 ,特别是“新时期”以来 ,在学术、生活上的足迹 ,看到他们的文学观念、观察视野、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取得的进展。简历和主要编著目录 ,除已去世的殷晋培外 ,均由本人提供。殷晋培不能参加这一对自己道路的回顾 ,他的资料也搜求不易 ,这都是让我们感到遗憾和愧疚的。

本书的署名 ,按《新诗发展概况》首次在《诗刊》1959 年 6 月号发表时的顺序排列。本书的设计、编辑 ,主要由洪子诚、张雅秋承担。张雅秋细致的工作 ,和她不少有创意的建议 ,对提高本书的质量起到重要作用。感谢朱竞、李云雷的支持 ,使“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的部分文字 ,能先期在《文艺争鸣》杂志和“左岸文化”网站发表。

洪子诚

2007 年 10 月 ,北京蓝旗营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

——『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

1959 年 2 月,和平里中国作协宿舍楼前。前蹲者为洪子诚,后左起:孙绍振、孙玉石、谢冕、刘登翰、殷晋培。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①

——“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

一、《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是如何发起、组织的？为什么是这六人的组合？对承担这一任务当时有什么想法？

谢冕：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们六人中，我，孙玉石，孙绍振和殷晋培当时是北大中文系 1955 级的同年级同学，我和殷晋培是一班，孙玉石和孙绍振是二班。在 1958 年“大跃进”中，我们年级响应“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起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其实就是批判我们的老师）的学术观点。我们利用暑假集体编写了“红色文学史”，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一时成为学术界大跃进的典型。1958 年国庆前夕，70 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正式出版。书出来后，我们年级就很有点名气了。^②

记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概是 1958 年的初冬时节吧，我在宿舍接到《诗刊》编辑部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诗刊》的负责人要到宿舍来看我，谈一些他们的设想。在约定的时间，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到了我所住的 32 斋学生宿舍。来的人是《诗刊》副主编徐迟先生，编辑部的沙鸥先生和丁力先生，他们都穿着厚重的大衣。徐迟先生跟我说，新诗发展已经三十多年，迄今没有一部用正确的观点写的新诗史。这件事靠一些专家做不好，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观点。克家同志和编辑部研究过了，建议由北大的同学来编一部

①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的注释，由洪子诚编写。

② 1958 年 9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北大中文系 1955 级学生集体编写的 75 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同年，《光明日报》9 月 27 日发表《出版工作的新方向》的社论，11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乘胜前进开展科学研究》的社论。在此前后，总结他们的成绩、经验的文章，陆续刊发于《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等报刊。

新的新诗发展史,时间要快,利用寒假的假期立即动手,争取明年(即1959年)开始在《诗刊》连载。沙鸥和丁力也都讲了些鼓励的话。那次谈话很具体,大体涉及了中国新诗的发展的历史以及关于新诗史写作的一些设想。至于参与这一工作的人数,我们觉得人少了做不完,人多了也做不好。人数多少,找谁来做,如何发挥集体编写的优势?他们建议由我来考虑,组织一些同学,组成一个集体的班子。

他们走了之后,我开始考虑人选。1955级的几个同学平时交往甚多,在这次集体科研中又加深了了解,一谈下来,大家都很投机,当然不成问题。大概是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对未来的诗史的初步结构有了一些想法,觉得六人比较适中。于是又征求刘登翰和洪子诚的意见,他们是1956级的,比我们低一届,大家本来都喜欢诗歌,也谈得来。六人的班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时都参加了学术批判的活动,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可说是充满了自信与豪情,那时我们不知畏惧为何物,都有一种舍我其谁、志在必得的狂劲。都说是少年轻狂,其实那个失去理性的年代本身也极力怂恿我们。现在有“无知者无畏”的说法,我们那时少不更事,不是无知,却是少知,而无畏则同。

孙绍振:1958年,我们1955级的学生利用暑假一个月,加上开学以后几个月的时间,编著了一部“红色中国文学史”。充斥于报章上赞扬性的报导,口气很大,说是北大中文系55级,作为党所培养的一代新人,正在把资产阶级专家所把持的学术殿堂夺回来。当时的苏联报刊也有反映。我记得似乎是《消息报》(苏联政府的机关报)也登了消息。我们同学集体讨论的照片上了《中国青年报》。文学史出版后,寄给陈毅等领导人。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从系里转到班级党支部书记费振刚那里的陈毅的信。外面套着国务院外交部的大信封,里面是陈毅私人的宣纸信纸,以水印的梅花作底。陈毅毛笔书法,多用侧锋转中锋,颇为俊俏潇洒,没有一点元帅气。^①除此之外似乎还

① 陈毅信写于1960年3月4日,称“你们写的文学史,前后共收到三套,抽空选读了几节,觉得很好,感谢你们送书的美意,目前因工作忙碌,不可能专读,也就不能提什么意见”。

有康生的来信,康生是书法家,但他的信是不是用毛笔写的,信封什么样子,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比陈毅的要长得多。^①在一片喜气之中,迎来了新的“战斗任务”,再接再厉编写“红色当代文学史”。虽然对此颇有争议,记得在一次报告会上,林默涵的意见就有点煞风景:当代文学才八九年,写什么文学史。但是,在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热潮中,林默涵的看法也不顶事。“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摆开了阵势。我被分配在诗歌组,而且当了组长。我有一点受宠若惊。在这以前,我虽然参加“红色文学史”的写作,最后还和谢冕一起写了“李白”那一章,但是,最初我是没有资格参与的。我在反右派期间,属于“中右”,也就是“差一口气”就沦为右派。要我这样一个“右派边缘”的人去夺取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殿堂,自己都感到心虚,没有沦为右派,就谢天谢地了,能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别的还能指望什么?暑假期间,我们几个比较右的,但还不是右派的分子,就在一个左派的带领下,去附近的农村劳动。但是,不久就被召回,参加了“红色文学史”的写作。虽然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甚至有时还有“混入人民队伍”之感,但是,我还是十分高兴地到“唐诗”这个组报到。各个章节都已经分配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章“唐诗的世界影响”,就分给了我。我哪里有钱写这样的题目?好在当时知识已经“公有”了,找到东语系和西语系的教授访问一番,把他们的说法和资料整理、组合一下,写起来并不难。参加这样的集体学术研究,我当时有一种浪漫之感。热火朝天的阅读和写作,差不多每天都开夜车,一连两个月。在这过程中,最开心的倒不是写作,而是逐渐把自己的“差一口气”的身份淡忘。等到“红色文学史”最后定稿时,可能

① 康生的信写于1959年11月27日,其中说到:“学生可以写书,而且可以写《中国文学史》这样大部头的书,这在两年以前,是不可设想的。对学生可不可以写书,可不可以参与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去年不少人是怀疑的。他们以为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我们也不应该有;前人所不敢作的事,我们也不应当作。特别是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和反对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他们在新生事物面前,评头论足,百般刁难,大泼冷水。当去年你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议论,说你们写的书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但是,你们在党的支持和鼓舞下,没有被这股右倾歪风邪气所吓倒,今天又重写了这部120万字的新著。书摆在人们面前,事实打破了人们的怀疑,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你们的各种仇言也不攻自破。”

是“李白”那一章原来的稿子不太理想,就让我 and 谢冕来重写。从此我就和谢冕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以前,谢冕属于年级里领导阶层,我则是一个小毛头,对他有一点望而生畏。也许是由于写作李白的机缘,后来写当代文学史,就是谢冕,把我提到了诗歌组组长这样的位置上来。

不久以后谢冕通知我,《诗刊》社的徐迟和沙鸥来了,要我们编写一部新诗发展史。当谢冕介绍我是诗歌组组长时,我真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当时徐迟是《诗刊》副主编,沙鸥是《诗刊》社的党支部书记。他们的意思,《诗刊》有一个设想,编写一部中国新诗史,这样的任务,不能老是依赖专家,应该让自己的年青人上阵。曾经考虑过别的学校,最后还是确定北大中文系 55 级的学生。时间很紧,当场决定利用寒假期间来完成。我在《智者生命的质量——怀念徐迟》这篇文章中这样写过: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人物,像小学生一样怀着虔诚的心情聆听他的教诲,但他并没有使我感到在他面前变得矮小。他留给我的印象倒不是他英俊的面庞,而是他谈吐间对于艺术的执着和忘情。记得他坐在我们双层床的下铺,忽然讲起了他所喜爱的荷马的史诗。我是读过他翻译的片断的。他激动起来了。说荷马描写一群大雁飞越天空的情景,不知不觉站了起来,不想头就碰在了双层床的上沿的横木上。他只是用手捂了一下头,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皱眉。我们本想笑的,看到他若无其事,也就很有修养地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

当时在场的似乎只有我和谢冕、孙玉石。任务这么急,三个人是不够的。于是分头去物色人马。谢冕提出 56 级的刘登翰,可能是刘登翰提出了洪子诚。因为谢冕和我都不太了解洪子诚。我去找了 55 级三班的钱文辉,他是无锡人,我们有时用吴语方言交谈,有些交往。但是,他拒绝了,说是寒假要回家。后来就找了殷晋培。这样六个人的班子就搭成了。对写作新诗史这样的任务,将会面临什么困难,我几乎没有任何忧虑。当时的氛围就是大跃进,打破常规。资产阶级专家皓首穷经地积累资料,正是我要批判的。政治挂帅,把党的文艺方针贯彻到底,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敢想,敢干,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是官方的语言,也很难说不是我们的思想。这是因为,我们当时对于历史使命有一种新的自信。



1959年2月,摄于和平里中国作协宿舍楼前。左起: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孙绍振。“这样,六个人的班子就搭成了。”

刘登翰:事情的起因我并不知道。听说徐迟来北大找过谢冕,我也不在场。事后谢冕告诉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才加入。当时的《诗刊》为什么选中北大,把这么一项重大的写作课题交给毫无学术准备和写作经验的几个大学三、四年级的毛头小伙子?这就需要从1958年的政治气候和学术氛围说起。

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一直延续到新学期开始,紧接着又展开了新一波的“向党交心”运动。这是继“反右”之后更广泛的一次整肃,用当时的话说是“引火烧身”:人人检查,个个过关,中心是狠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白专道路”。那时候学校不以读书为荣,反以读书为罪。专心致志读书做学问或发表过一点文章的同学,都被“枪打出头鸟”。1957—1958年的冬春之交,全校拉到十三陵修水库,真正在“皇帝头上动土”。由冬修水利开始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也蔓延到校园,“日写民歌三百首”的口号响遍各系各

班搭设的擂台。随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放高产“卫星”，和砍树砸锅、遍地狼烟的“小高炉”炼铁，使整个中国处于极端亢奋的“大跃进”狂热之中。平静的校园从“反右”以来再也不曾平静过。这年夏天开始的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为中心的“科研大跃进”，便是社会上各行各业“大跃进”在校园里展开的一个侧面。那时更为煽情的口号是“把被资产阶级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提倡在“大破”中“大立”，于是写“史”便成为一种时髦。中文系55级苦战两月完成的“红色中国文学史”，被推崇为无产阶级占领学术阵地的一个典型而靡声全国。全国各地的大学都紧跟不舍。我所在的中文系56级3班，先是围绕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展开了一波蛮横的“批判”，紧接着就在中文系党总支的统筹下，在55级撰写《中国小说史》的同时，分工撰写《中国古代戏剧史》和《中国新文学史》。

当时“革命”的方法也很简单：先是确定一个对象，比如要批判王瑶先生，就先把他的书通通找来“搜”读一遍，或者直接找他本人访谈，然后根据他著作或访谈所提供的线索，去查找资料，挑出茬来就上纲上线。如此苦战几个通宵，便可完成一篇“论文”。在这样的背景下，《诗刊》编辑部提出编写新诗史并找到北大来，便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我从中学时代就喜欢诗歌。1956年考入北大以后，在琳琅满目的学生社团中，唯独选中北大诗社。1957年2月北大文学刊物《红楼》创刊，我投去了一点诗稿。三、四月间，主持《红楼》诗歌组的谢冕，拉我进《红楼》当了诗歌编辑。张炯当时也在《红楼》的小说组。或许由于都是福建老乡，交往便多了些。那时中文系都住32斋^①，我们住四楼，55级住三楼。我常到三楼他们宿舍去。1958年夏天，北大团委组织创作组，调我参加。在16斋给了一个小房间，任务是以邓中夏为典型写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负责人先是中文系54级的周强，后来是张炯，成员还有任彦芳、刘文昭和后来加入的张时鲁等。当时，学校的话剧组由温小钰执笔写了多幕剧《时代的芳香》，内容大概是写“科研大跃进”的，演出很是轰动，无形中给了我们很大压力。我们整天忙于访问五四老人，到北影讨论提纲，折腾了几个月，改了

① 北大过去的学生宿舍，和一些建筑物，都用“斋”命名，搬到西郊的燕园之后也是如此。如德斋、才斋等。“文革”开始后，认为“斋”的名号是封资修体现，遂改为“楼”而延续至今。

中文系男生住的 32 斋,如今已更名为 32 楼。“六个人的班子”就来自这里。

几稿,终无成果。期末我离开创作组回到班上,同学们都夜以继日地赶写《中国戏剧史》,我插不上手,闲在一边。正好谢冕来邀,便很乐意地答应了。

当时我和子诚在一个班,同一个宿舍,同一张架子床,他睡上铺我睡下铺。他家在广东揭阳我家在福建厦门,离京城都途遥千里,寒暑假皆难得回家。在“大跃进”那种风气下,我们有一个时期和另一个同学廖东凡,过着近乎“共产公社”的生活。我的衣服他穿,他的钱我用,成了彼此不分的好朋友。谢冕来后,我把编写“概况”的事告诉他,征得他同意后便向谢冕推荐。

孙玉石:就我自己来说,开始是怎样接受写作《新诗发展概况》这项任务的,事情的缘起,以及最初的过程,今天几乎是没有什么记忆了。就思想和心境来讲,早在1956年开始,我们这些颇有些自视不凡、胸怀大志的毛头小伙子,就经由了由高峰到低谷又转入另一种“高峰”的思想历程。先是沐浴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等政策实施带来的和煦春风,一方面,我们陶醉于游国恩、魏建功、王力、高名凯、吴组缃、林庚等一些名师讲课的令人神往赞叹的“名牌菜”;另一方面,也如饥似渴地沉醉于普希金、莱蒙托夫、巴尔扎克、雨果、萧洛霍夫、曹禺、艾青、聂鲁达、希克梅特、洛尔伽、阿拉贡等创造的美妙的文学世界。怀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异想,各自做着或写小说,或当诗人,或搞研究,或干一番其他事业的幻想。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反右派运动的冷风和悲惨,将我们这些“梦中人”,都从各自如幻似梦的世界中吹醒了。许多喜爱诗歌的朋友,富有文学才华的学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不幸罹难。我们这些幸免者,也多从“寻梦者”的世界中,回到冷峻的现实生活中来,开始了一种不断自惭自审自赎、“原罪”式的小心翼翼的求学生活。当时的学生中,反对个人奋斗,反对走白专道路,反对成名成家的“正声”,使得渴望文学创作,渴望研究学问,渴望施展各自才华,去撷取人生或艺术的美丽果实的意愿,成了许多人藏匿于心之深处,不敢言说的被压抑的潜流。

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们哼着“方志敏团歌”^①,投入修建十三陵水库

① 1958年春天修建十三陵水库,北大各系都以军队建制方式组织,中文系命名为“方志敏团”。“团歌”的歌词大概由谢冕等撰写,套进当时流传甚广的苏联革命歌曲的曲调中。